

60年，中国面临怎样的历史新起点

卢周来

摘要：通过系统性剥夺农民与农业，为城市化与工业积累资本的战略，使得中国城乡与工农差距越拉越大；通过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支付“制度租金”与“改革开放成本”，使得中国地区差距越拉越大；通过“亲资本”刺激投资积极性，使得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从1990年占GDP19.6%下降到2007年不到11%。中国制度转型造成的贫富鸿沟在世界上是十分惊人的，它已威胁到中国未来发展。处理好进一步发展经济必须面对的市场范围、资源与资本三重约束，这一挑战使得中国再度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后的30年，是中国由经济转型转向现代经济起飞的30年。如果说中国60年发展在绝大多数时间内并没有市场范围与资源的压力，因此，并不能彰显出中国发展经验的独特性的话，那么，在推动经济转型与起飞的资本积累与深化上，中国经验的独特性表现得更为明显。这种独特性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中国主要是用国家或政府的力量来快速推动资本积累与深化。前30年，中国资本积累的主体是国家，国家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控制，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政权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有限的资本集中到中央计划当局手中，并将其投资到同样的由国家布点的旨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的项目，从而的确实现了在最短的时间最为困难的条件下，由一个落后的传统农业国一变为工业为主的国家；后30年，一方面，中央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集中全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布点尤其是基础设施方面的功能；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更注重通过“分配激励”，调动海外资本以及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而在这其中，除了中央政府确定大的路线方针政策之外，地方政府在以各种“激励性措施”引进或筹集资本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给资本要素以更高激励来促进投资的结果，是使后30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起飞。总之，利用国家与政府的力量完成资本积累与深化，使得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社会主义大国，成功地实现了“赶超战略”。这使得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后发国家仍然未能摆脱贫困泥淖的时候，中国成为20世纪以来少有的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

其二，中国在推动资本积累与深化过程中始终注意通过国家力量把社会不平等限定在可控范围之内。中国社会主义面临的“历史悖论”，使得其在公平与效率之间面临的权衡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复杂：如果我们过多强调“社会主义”中公平一面，但很难饮到“现代生产力的甜美酒浆”；但如果我们更多偏向“发展生产力”，结果，“用人头当酒杯”现象又可能难以避免。惟一的选择就是我们只能在坚持和发展生产力前提下，尽最大可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现象发生，同时还只能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公平存在，但要将这种不公平限定在国家可控范围之内。事实上，中国前30年资本积累，更多地依靠国家有意识制造的“工农业价格剪刀差”以及“先生产后生活”思路下城镇工人阶级的“低工资与低福利”。

按理说，这会极大地恶化社会不公平，甚至搞不好也会重演资本主义早期历史。但中国政府通过建立起社会保障网，总体上避免了这些现象的发生。在城市，社会保障网覆盖了全体居民，他们占了总人口30%；人们在就业、养老、医疗方面几乎没有后顾之忧。在农村，一方面，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家庭内部养老传统得以维持，同时“五保户”制度保障了孤寡老人的生活；尽管医疗水平较低，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农民能够看得起病。社会保障网的完善同时还得益于低成本运作的公共服务体系。经济转型之前，中国政府在公共卫生、消灭流行性疾病方面成绩十分出色，但成本却不高。这一方面得益于在农村广泛采用传统医学以及赤脚医生制度，另一方面得益于强调人人参与的基本环境卫生要求。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成本也很低。当时的百姓从来不会考虑因为经济困难而让孩子上不起学的可能性。中国后30年资本积累与深化过程中，尽管各级政府为了谋求经济更快发展有意识“亲近资本”，尽管一段时间内存在前30年社保体系运转失效而新社保体系未能及时建立的间隙期，但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中央政府把思路从十四届三中全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调整为十七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用了不到15年时间；而中国从一个社会保障非常缺乏的社会，到现在基本勾勒出全民保障的蓝图，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相比之下，西方自英国《济贫法》出台到建立起完整社保体系却用了300年。

60年后，中国再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按中国传统历法，60年一甲子，构成了一个循环。此后，时间又要回到新的起点。尽管前60年中国发展避免了大国崛起过程中“用人头做酒杯”现象发生，但60年后的今天，处在崛起过程中的中国，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挑战仍然来自于生产能力扩张后，如何处理进一步发展经济必须面对的市场范围、资源与资本三重约束。这一挑战也使得中国再度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在“市场范围”的扩展上，中国传统式努力正面临内外交困的局内。在国际上，60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份额不断增加，不仅处于同一梯度的发展中国家利益把“中国货”视为竞争对手，而且发达国家也认为其既得利益正在被“中国货”所逐渐蚕食。在此背景下，近些年来，专门针对中国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世界各国纷纷抬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贸易纠纷最多的国家。而从国内看，中国过去60年特别是近30年在国际上扩展“市场范围”，凭借的是低廉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的所谓“比较优势战略”。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一战略将长期使这个国家产业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并形成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始终要忍受国际资本残酷的掠夺与盘剥，这种盘剥最后会落实到对劳工阶层的剥夺上；同时，处于价值链最低端的产业往往也是资源密集型产业，长期发展对这个国家的环境与资源造成的破坏甚至是不可修复的；加之由于产品过低利润空间，使整个产业对成本变动异常敏感难以通过产业升级来平衡由此带来的币值、原材料和劳动力上升的压力。因此，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开放、不断更深度参与全球分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结构性缺陷——内需不足、资源与环境代价过高、核心技术缺乏、国富民贫、收入不公——等问题都因此战略而日益累积并逐渐凸显。

在新中国建国60周年前夕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已经在表明，中国过去扩展“市场范围”的努力，有可能快走到了其最大可能性边界。中国的“比较优势战略”实际上是将自己的命运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捆绑在一起，形成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因此中国经济的好坏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表现，尤其是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产品出口需求。但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已经表明世界经济那种“美国人负责消费和印美元，中国人负责生产产品”的“恐怖平衡”已经无法持续；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对中国产品需求急剧下降，且纷纷重拾“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得中国处于产业

低端的出口导向型实体经济几近瘫痪。这一严峻的事实表明：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已经不能再指望传统的扩展市场范围的方法。下一步，中国的发展如何突破“市场范围”的限制，恐怕得另谋出路。

在打破“资源瓶颈”上，中国也正面临越来越刚性的约束。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国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我国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石油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60年前，中国经济发展所消耗资源的比例占世界的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60年后，中国每年消费了世界上15%的能源、32%的钢、30%的锌、25%的铝、23%的铜以及18%的镍、54%的水泥。中国二氧化硫排放水平1996~2007年平均为143.10吨/万人，而到了2007年就达到了161.96吨/万人；工业烟尘排放水平1996-2007年平均为54.21吨/万人，2007年则达到了58.36吨/万人；工业粉尘排放水平1996-2007年平均为56.32吨/万人，2007年就达到了59.78吨/万人。按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提供的数据，中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排放总额在2008年首度超过美国列年度世界第一。

然而，从国内看，**在经过60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国内的环境与资源承载能力已经接近极限。**以石油为例，中国剩余可采储量为23.8亿吨，以目前的产能计算，14年后出现石油枯竭局面。与此同时，对环境与资源的过度使用已经使得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空间紧张。近十年来，中国国内冰川不断消融，淡水资源严重污染，酸雨面积覆盖全国，炎热、干旱、洪涝、风暴等气象灾害频发，森林、草场火灾增多，沙尘暴和荒漠化加剧，表明中国国内环境与资源已无法继续支撑一个大国后续的崛起之路。事实上，近十几年来，资源、能源短缺已迫使中国不得不增加进口。2007年，中国有色金属矿业的外贸依存度为18%；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纯进口国，2007年中国进口原油达1.6亿吨，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已经超过了50%。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25年中保持平均6%的增长率，中国对一次性能源的需求将在2005年的17.42吨油当量的基础上再翻一番，达到38.19亿吨油当量，为此，中国石油净进口量将从2006年的每天350万桶，增长到2030年的每天1310万桶。净进口在总需求中的比例将从50%上升到80%，地球可采集石油也因此将在2056年前后耗尽！这充分表明，如果中国经济不改变对传统资源的依赖，恐怕世界这口“小浴缸”也盛不下中国这头“大象”。也正是出于对此的恐慌，近些年来，一方面，国际市场上凡是涉及到中国需要大量进口的大宗资源类产品，都竞相涨价；另一方面，以所谓“绿色条款”针对中国的各种指责及不平等贸易政策频繁出台。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22日，《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获得美国众议院的通过。按照这一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不实施碳减排限额的国家进口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征收边境调节关税。可以想象，一旦“碳关税”实施，其严重性应该是扼住了中国这样仍然依赖传统碳燃料为主支撑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咽喉！而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主权国家内征收“碳税”与国际范围内征收“碳关税”一定会成为现实，只不过是留给中国的过渡期有多长的问题。从这点看，中国未来发展在面临的资源约束上的确是刚性的。

最后，**在通过“选择性激励”进行资本积累与深化策略上，中国也面临利益矛盾越来越尖锐的考验。**通过系统性剥夺农民与农业，为城市化与工业积累资本的战略，使得中国城乡与工农差距越拉越大；通过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支付“制度租金”与“改革开放成本”，使得中国地区差距越拉越大；通过“亲资本”刺激投资积极性，使得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从1990年占GDP19.6%下降到2007年不到11%。实际上，“亲资本”战略还造成了转型期中国较为广泛的官商勾结，从而使得腐败与非法暴富现象十分普遍。国际范围内相关研究成果表明，至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从低到高排序，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到第85位，已经与后面35个社会分化非常严重的国家的水平相接近。世界银行据此认为，中国制度转型造成的贫富鸿沟在世界上是十分惊人，中国的整体不平等“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恶化最快的”。

社会公平状况恶化，已经导致中国国内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日益复杂，并由此威胁到中国未来发展。首先，不公平感将鼓励人们不进行“生产性努力”而进行“分配性努力”。人们认为社会不公平，实际上是认为所付出的与所得到的不成比例。在这种情况下，更倾向于通过各种非生产性手段手段，试图与既得利益者重新分享已有的成果。而一旦人们进行这种分配性努力成为“习惯”，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更严重的是，“分配性努力”的后果是各阶层之间“分配性冲突”增加，导致社会不稳定。可证实资料表明，1994~2004年，全国刑事犯罪案件年均增长速度为11.0%，非法群体性事件年均增长22.2%，参与人数年均增长17.8%，均超出同期全国GDP年均增长速度。社会不稳定的后果不仅是投资者对投资的安全性缺乏信心，因而减少投资；更迫使社会把更多宝贵的公共或私人生产性资源用于政治与社会安全。最后，不公平抑制了中国社会消费。简单地说，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将会造成如下局面：“要买东西的人没有钱，而有钱的人不需要买东西”。收入分配过于悬殊，已成为中国启动内部消费的致命伤，2007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不到4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3%！消费不足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投资与出口，而一国经济发展长期过份依赖于投资与出口显然也是不可持续的。这也表明，中国未来发展需要更为均衡与协调的策略。

科学发展的确是中国实现新飞跃的必由之路

从积极的眼光看，当下中国面临上述挑战，恰是因为中国经过60年后发展后，其经济能力与战略能力已经积累到了新的临界点，也正因此，世界都在关注并猜测中国未来走向。

如果中国继续按照传统的发展思路，中国未来崛起的过程将不得不重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为避免国内矛盾加剧，不得不外化其矛盾；中国大国崛起，也必将冲击现有世界秩序。为此，中国不得不走上“强力崛起”之路。这也恰是近年来国际范围内所谓“中国威胁论”盛行的主要原因。正如美国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曾撰文说^①：“一个富裕的中国将是一个决心获得地区霸权的侵略性的国家——不是因为一个富裕的中国将具有邪恶的动机，而是因为任何国家为了生存而使它的繁荣达到最大限度的最佳办法就是统治世界上它所在的地区。”

然而，如果中国未来的崛起果真是按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即资本主义的逻辑未能避免冲突或战争，那么，不仅中国的发展模式因其不具备独特性而对于世界的贡献将会大打折扣，而且中国自身未来的崛起也因此更加充满不确定性。也正是在这关头，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了科学发展的思想。究其实质，科学发展倡导走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绿色发展之路。解决资源与环境约束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走成果共享型和谐发展之路。在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大国的前提下，通过提高国民收入占GDP比重、劳动收入占全社会收入的比重，让百姓有钱消费；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让百姓敢于消费；通过理顺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这样不仅有利于社会和谐，更可以通过扩大内部消费解决“市场范围”问题；最后，只要中国未来发展走上了环境友好型绿色发展与成果共享型和谐发展之路，中国也因此不会从外部世界索取更多利益，在世界范围内走和平发展之路也就有了内部的根本保证。

（作者：中国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① 转引自庄礼伟《中国：建设性崛起》，《美国倍可亲新闻中心》2004年1月3日。